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
主编 张宪文等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杨菁

著

历史关口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非外借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

主编 张宪文等

历史关口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杨菁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 杨菁著; 张宪文主编.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10
(“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060-9501-3

I . ①宋… II . ①杨… ②张… III . ①宋美龄 (1899-2003) —人物研究
②西安事变—研究 IV . ① K827=7 ② K26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1416 号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SONGMEILING YU XI'AN SHIBIAN)

作 者: 杨 菁

主 编: 张宪文

责任编辑: 辛岐波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 100007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5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501-3

定 价: 59.8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4086980-823

“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编：张宪文 邱进益

编 委：吴 恕 陈谦平 朱宝琴 姜良芹 杨 菁

武 菁 张 瑾 郭红娟 陈英杰 张立杰

潘 敏 吕 晶 李 宁

总 序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开放，史学界对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开始较多地关注蒋介石与宋耀如家族，对宋子文、宋庆龄发表和出版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学界对另一位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宋美龄却问津甚少。坊间虽然出版了关于她的一些著作、画册等，但是如何审视过去对她的一些误判并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无疑是历史学界应尽的责任。

2009 年 1 月，我与南京大学三位教授飞赴台北，在邱进益博士的引荐下，与“妇联会”辜严倬云女士相会，商讨合作研究宋美龄事宜。双方相谈甚为融洽，确认了积极开展宋美龄研究的学术计划。时间已经过去多年，《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九卷、《宋美龄文集》五卷，均已顺利完成撰著和编纂工作。其中《宋美龄、严倬云与中华妇女》于 2012 年由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宋美龄文集》（五卷、繁体版）于 2015 年由台北苍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是海峡两岸学术合作和宋美龄学术研究的大事，值得祝贺。

宋美龄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著名的女政治家、中国妇女运动的推动者和指导者。2003 年 10 月 24 日（北京时间）逝世于美国纽约。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于当日发去唁电，表示哀悼，并对这位成功跨越三个世纪的政治家给予了高度评价。

宋美龄祖籍海南文昌，出生于上海。幼时跟随家人赴美国读书，后转入韦斯理学院深造。受家族影响，笃信基督教，是一位

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1917年，宋美龄学成归国。作为一名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女青年，她进一步融合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彰显了中国现代女性的特质和风度。

1927年，宋美龄与蒋介石成婚。之后走上政治舞台，与蒋介石东奔西走，逐步展现其政治才华。作为一名重要的民国政治人物，凭借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宋美龄亲历了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作出了她的历史贡献。

宋美龄较早地献身于中国的妇女运动，领导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安抚遗孤，培养教育为国捐躯壮士的后代。即使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兵败退台后，宋美龄仍对引导妇女服务军界、筹建军眷住宅、推动社会福利事业、扶助难童和残障人士等事业表现了特别的关切。

早在19世纪后期，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然而革命后的社会改造却是更为复杂和长期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掀起了新生活运动，尝试改良社会风气、移风易俗、改变不良习惯、规范国民生活，虽然这一运动并未取得明显效果，但宋美龄奔走呼号，成为此项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国共两党走上团结抗日的重要转折点。宋美龄亲赴西安，力劝蒋介石转变态度，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宋美龄一生最光辉的政治亮点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她不仅亲赴前线、引导妇女投入战地救护工作、着力建设中国空军、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拓展中国在南亚的影响，而且还远赴美国，争取美援。其在美国国会的演说，震动了美国政坛，展现了她的外交风范和智慧。抗日战争后期陪同蒋介石出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更加显示了中国女政治家的才能。

晚年，宋美龄逐步脱离台湾政坛，赴美久居，放手让蒋经国治理台湾。终宋美龄一生，其政治生涯既辉煌，又曲折。她为推

动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奉献了智慧和力量，是一位值得浓笔重写的杰出女性。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组织多位历史学教授，依据大量原始史料，撰著的这套宋美龄研究丛书，有《我将再起：宋美龄的后半生》《家国春秋：宋美龄与宋孔家族》《历史关口：宋美龄与西安事变》《东方魅力：宋美龄与战时中国外交》《新民新风：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社会改造》《陪都岁月：重庆时期的宋美龄研究》《美丽哀愁：宋美龄年谱》《吾心吾力：政治视阈中宋美龄的思想历程》。这些著作的撰写，作者虽然努力做到尊重历史事实，给宋美龄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述，但毕竟受学术水平和掌握史料所限，因此，著作中疏漏及不当之处，尚请各方人士给予指正。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张宪文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夫唱妇随”的宋美龄	(20)
第一节 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	(20)
第二节 第一次西安行	(34)
第三节 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40)
第二章 惊闻蒋介石被“劫持”	(50)
第一节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50)
一、张、杨从“剿共”走向“联共抗日”	(50)
二、临潼捉蒋	(62)
三、扣蒋后西北的军政部署	(75)
第二节 西安事变为“称兵作乱之叛变”乎?	(82)
一、初闻事变,“震惊莫名”	(82)
二、姑信张学良言之由衷	(95)
第三章 力争和平解决事变	(106)
第一节 “戡乱”方针的确定	(106)
一、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106)
二、“一致拥护”下的同与不同	(116)
第二节 宋美龄力主和平解决事变	(136)
一、宋美龄的和平主张思想	(136)
二、力阻武力讨伐	(148)

第三节 宋美龄力排众议的有力后盾	(156)
一、各国对事件的反应	(156)
二、家族内部的鼎力支持	(173)
第四章 “牵线”宁陕	(188)
第一节 与张学良的电函往来	(188)
第二节 派端纳赴西安	(195)
一、端纳与张学良、蒋介石夫妇	(195)
二、端纳的“奠基”之行	(201)
第三节 促成宋子文飞赴西安	(211)
一、宋子文与张学良	(211)
二、“子文树柱壁”	(220)
第五章 亲赴西安	(233)
第一节 “余妻真来耶？”	(233)
一、冒险赴陕	(233)
二、促蒋转变	(242)
第二节 宋美龄斡旋于三方之间	(262)
一、中国共产党主张有条件释蒋	(262)
二、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	(271)
三、促张释蒋	(279)
第六章 介入西安事变之善后	(292)
第一节 蒋、张离开后的西北局势	(292)
第二节 杨虎城致电宋美龄	(299)
第三节 张学良受军法审判	(316)
第七章 蒋、宋笔下的西安事变	(329)
第一节 《西安事变回忆录》与《西安半月记》 的出版与反响	(329)
第二节 传播学视域下的《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 回忆录》	(339)
余音 宋美龄与幽禁中的张学良	(349)
参考资料	(368)

导 言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对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由于立场不同、利害各异，国共双方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有着不同的评价和解说。随着权威或非权威的档案，当事或非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的问世，事变期间有关电报的公开，对于事变和平解决的说法虽仍莫衷一是，但宋美龄的身影却是越来越清晰、突出。研究宋美龄与西安事变，不仅直接关系到对宋美龄的评价，也关系到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评价。透过宋美龄，她的出场与活动，还可反观西安事变的发生及解决在当时国内、国际引起的巨大震荡，丰富西安事变的研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乃合力之作用，此话不偏不倚，颇能为各方接受，然合力中包括哪些因素，谁主谁次，则说法不一。如何看待宋美龄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既关乎个人的立场（国共两党的不同立场、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立场）、主观识见与好恶，也与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包括对事件的不同面向、事件中各方当事人的了解）有关。欲合理定位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与作用，首先且必须对两个事实有清楚、客观的认识：一是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不同态度及由此采取的措施；二是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的意义。

西安事变发生后，对抗已达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在第一时间

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国共两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不同反应，及应对方略的确定与调整，是宋美龄出场并逐渐成为事件又一主角的前提。

1936年12月13日，延安的《红色中华》^①在第二版以《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杨虎城坚决的革命行动》为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12月16日，在第一版发表社评《西安抗日起义的原因》，文中对这一事件定性为：“西安于十二月发动抗日起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果敢的手段，拘留汉奸蒋介石及其他重要人物，这一事件是抗日的起义。”“西安的抗日起义，拘留蒋介石及其亲信，这是抗日的起义，这是蒋介石自己出卖中国，镇压全国抗日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行动正是除去抗日援绥道路上的障碍，是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有利条件。”^②之后，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各方反响及国内国际形势之变化，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出两点总结：（一）“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二）“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威胁的新的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并提出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

①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曾一度停刊，当红军到达陕北后，又继续出版。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

② 《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6日，第1版。

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造成的。（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加迅速地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为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共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①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发表通电，向国共双方提出如下建议：“（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抗日，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②中共认为，“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

延安方面由起初称赞这是一次“革命行动”，指称蒋介石为“汉奸”，到承认“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威胁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已有了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事件的转变。

再看南京方面，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评《时局的定力》，指出：“自古乱臣贼子，当其包藏祸心，图谋不轨之先，必有佯作谨愿或故布稚骏，以蔽其奸，及其称兵谋逆，犯上作乱之日，又必假借名号，劫持君亲，以肆

^①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23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1页。

其毒。”“今日窃据西安之叛卒，其行动等于匪盗，其意志只图扰乱，匪盗之集团，不足以语政治主张，更无可言政治目的，全国人民与世界友邦，必须彻底了解此一意义，然后可信国民政府今后之方针，当仍本中国国民党之主义与政纲，积极推行。对内对外，一贯努力。”^①并在前一天以《张学良率部叛变！国府下令褫职严办》为大字标题，报道了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处置办法：“国民政府十二日令，据报张学良于十二日通电叛国，殊堪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凛遵无违，切切此令。”^②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作出了讨伐决定：“（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即下讨伐令。”^③路透社对此评价说：“今日中政会决定下讨伐令，任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由此可见中央已放弃用谈判方法解决此次事变之概念，而决心不问代价如何，诉诸武力，俾可在最短时期内剿灭叛逆。”^④



何应钦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宋美龄认为：“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挾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

① 《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4日，第3版。

② 《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3日，第3版。

③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第313页。

④ 《申报》，1936年12月17日，第3版。

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①周恩来在12月18日致毛泽东的电文中，曾就国民党党内的分歧做了说明：“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②

12月18日，当蒋鼎文携蒋介石亲笔函抵达南京，嘱何应钦暂停轰炸三日后，何应钦于19日在孔祥熙寓所召集居正、孙科两院长，及叶楚傖、宋子文、王宠惠、宋美龄诸人进行会商，决定两项事宜：“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暂行停止轰炸。”至此，孔祥熙认为“军事压力已足使张杨丧胆，而委曲求全之政策仍在努力”^③。然而，立法院院长孙科于20日在上海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仍称：解决西安事变甚易，如以军事力量不出二三星期，绝对不谈政治问题。^④

显然，不诉诸武力、安全救蒋出险是南京主和派的目标，这就要涉及孙科所说的政治问题，在南京方面看来此乃“委曲求全之政策”。

由国共双方制定的政策可见，双方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不同的理解和设想。共产党的目标是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为此确定了有条件释蒋的方针。当“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⑤后，共产党认为“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

① 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见蒋中正、蒋宋美龄合著：《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回忆录》，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1页。

② 《周恩来关于国民党各派人物的表现及蒋介石态度给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0页。

③ 《宋子文委员赴西安之决议》（1936年12月19日），见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第134页。

④ 《申报》，1936年12月21日，第9版。

⑤ 《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关于西安事变解决之经过给刘少奇电》（1936年12月27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80页。

“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①。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详细解答了“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说：

自从日本侵略开始，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的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②

在共产党看来，蒋介石的安全回到南京尚不是最后结局。中共中央在《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说：“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需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③

国民党的主和派反对南京对西安的武力讨伐，希望用和平方法救蒋介石出险，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维护蒋介石的声誉，谈判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5、277页。

②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节选）——关于西安事变问题》（1937年3月1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85页。

③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7页。

是营救之手段。对于国民党来说，蒋介石的安全回京即宣告事变已和平解决，余下的是如何处置张、杨，以及西北的善后问题。

总之，在南京方面确定西安事变的解决方针及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宋美龄的活动和影响不容小觑。在共产党秉承“有条件释蒋”方针而从事的活动中，以及释蒋后为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局面而展开的活动中，宋美龄的身影同样清晰可见。

二

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而关键的一环，亦是合理定位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与作用的关键。南京方面，无论主和还是主战（即便主战被直斥为有险恶用心），都声称以营救蒋介石为目标。12月24日，在蒋介石临离开西安的前一日，国民政府还下达了《讨逆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为讨伐西安叛乱，特任讨逆总司令，指挥国军统辖讨逆军事”，“讨逆总司令直隶于国民政府，其关于军务政务党务等连（联）系事项，由各主管机关协助办理”。何应钦制订的《讨逆军作战计划》的方针是：“讨逆军为迅速击灭叛军，营救蒋委员长出险，应乘共军部队，尚未与张、杨会合之前，由东西两路，向西安夹击，一举捕捉张、杨叛军主力而歼灭之；同时以有力一部，在潼关、华阴间，渡过渭河，向三原、耀县地区挺进，迂回至西安侧背，以遮断叛军向陕北逃窜之路，并相机阻击南下之共军。”^①无疑，南京方面若不能救蒋出险，对西安必有一战，共产党指出的西安事变发展的第一种前途即内战的爆发就有可能发生。

共产党方面，虽然西安方面未“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即释放了蒋介石，但有一细节还是值得重视的，即“蒋抵洛后当夜已下令撤兵”^②。1937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

^① 何应钦：《讨逆军作战计划》，见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161页。

^② 《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关于西安事变解决之经过给刘少奇电》（1936年12月27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80页。

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① 2月13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各兵团首长电：“西安事变后有两种前途：（一）是大规模内战。（二）是和平解决并停止‘剿共’。党中央一贯采取和平（方针）应力争第二种前途。”“两月以来克服种种困难，经过许多波折，终于达到和平解决的目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将于十五号举行，党中央有致三中全会电。党将依照这电来进一步地巩固和平，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②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第31次常务委员会，决定于1937年2月15—22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和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国民党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谈了他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认识。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宋子文接受抗日主张与释放蒋介石，促使国民党三中全会改变了对内、对外政策，而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改变标志着“对内和平，对抗战主张的胜利”。他说：“西安事变之发生完全和平解决，使国民（党）三中全会公布了张、杨八项主张，通过了《根绝赤祸》的决议案，这是应□□划时代的改变。我们应该估计，他（它）是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初步成功，不应该估计他（它）是失败，但这一成功仅在开始，发展过程中的困难障碍和变化正多，胜利的保障只有从斗争和力量对比中以决定。”对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立场，周恩来亦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蒋及国民政府利用统一和胜利（继）续发展其中间道路立场，他一方面接受了全国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希望，停止着‘剿共’的内战，通过了容许共党红军讲和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决议案，容许了西安事变及其以后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主张渐渐抬头，进行着与共党红军进一步的谈判；但另一方面却在利用日本的缓和与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78页。

② 《中央军委主席团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情况和党的方针给各兵团首长电》，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79页。